

访谈詹明信：拥抱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盛宴

刘 超

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以其集大成式的文化批评理论对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诸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学者对詹明信也同样并不感到陌生。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8)等著作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他还曾于1985年及2002年先后两次访华，并将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揭开了中国学术界长达十余年的“后学热”的序幕。我一直以来希望能有机会以《跨文化对话》名义对詹明信进行专访，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年1月，詹明信荣获由现代语言学会(MLA)所颁发的终身学术成就奖，并应科罗拉多大学之邀，将赴该校短期学术访问。我获悉这一消息后，便委托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的刘超博士与其联络，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跨文化对话》的专访。获得詹明信先

生慨然允诺后,我和刘超立即着手准备提问问题,此间曾征求过国内学者乐黛云先生、王宁和周宁教授等修改高见,旋即我们将我们精心准备的提问发给詹先生预先过目。2月24日上午,刘超携我们共同的设问,代表我前往詹明信先生下榻的宾馆进行访谈。詹先生特意推迟了科罗拉多大学所组织的官方宴请活动,热情接受了《跨文化对话》的专访,他不顾旅途辛劳,和我们就其理论的最新发展、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全球化语境下中西文化交往等话题侃侃而谈,展开广泛探讨,使我们收获良多。詹明信先生在与我们交谈过程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未能摆脱某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的困扰,但他对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和谐共生的远景依然寄予了厚望。在访谈临近结束的时候,我们赠送给詹明信教授第二十八辑《跨文化对话》杂志,而詹明信则表示,他目前的研究方向已从文化批判重新转向文学批评领域,他最近一本关于现实主义起源及流变的新著,也即将付梓,与广大中国读者见面。以下的文字,系刘超博士依据2012年2月24日詹明信访谈录音整理、翻译而成,已呈送詹明信教授审阅,并获准发表,在此谨致谢忱。

——钱林森,2012年7月22日,南京秦淮河西

问:如果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视为某种阶段化的叙事范畴的话,您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划分和描述并确定其相应的文化特征的?您过去曾做过历史的分期,您现在是否对此观点有所发展?

答:我的理论实际上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三个阶段。它们是19世纪真正的国家资本主义(基于国家的)、帝国主义以及去殖民地化之后的全球化。我的理论只是做一种大致的阶段分类。与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对应的是不同的文化时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所以在这儿采用的是历史叙事的方式。显而易见的是,由于它们是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在这三个阶段之间一定有着一脉相承或者相互差异的关联。但在我看来,它们在日常生活、文化产物等等很多层

面上存在着有意义的差异,在文学上这种差异类似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上述三个阶段都属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但有着各自的特征。

问:您在很多场合表示拒绝使用主体性这一概念对现代性进行诠释,却为何又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中将主体性的消解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呢?在这个意义上,您对主体性是如何定义的呢?

答:你要和我讨论主体性经验,然而主体性可能是一个太泛泛而论的词,我们应该讨论比如自我以及个人主义之类的概念。在我看来,充斥着所有阶级之间各种竞争的资本主义刺激、产生了一种基于自我意识形成的个人主义,然而在资本主义晚期,自我意识功能逐渐弱化。从竞争本身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19世纪晚期是一个扩张时期,各国相互征伐,而自我意识的侵略性便在这些争斗中发展起来。现在这个时期存在着难以计数的合作,在这些合作中竞争机制不再鲜明,这无疑是自我意识弱化的原因之一。从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视角看,你也可以思考家庭的衰落、父权的衰落等等。我相信在今天通行的文化批评以及文化应用中,人们讨论隐私的消亡,这是另一种考虑自我意识弱化的方式,即你可以想象自我意识、个人主义是一种对抗外部世界封闭的堡垒。在信息时代,随着各种新信息传媒等的出现以及各异的发展,这些壁垒被一一打破。所有人都知道所有事,因此隐私——自我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可疑。而我们同时应当记住,在某种意义上,自我的概念是我们自身特有的概念,它是一种私有财产。只要与私有财产相关联,自我便也是我们的慰藉。我想这就是我接下来讨论主体性衰落的方式,主体性还有着许多其他特征。所以我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说主体性是自由、个人主义、自我意识。我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意识,这种意识更为客观,我在昨天晚上的讲座中谈到过,与以往的理论相比它基于一种更多数人之间的平等。因而这一观念也倾向于降低个人的重要性,并将这一重要性向更多的人开放,但是只要你愿意,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

然而这是一种有益的无差别,它似乎比一种有害的无差别要好。

问:我们读过盖尔纳(Gellner)的一本书,他提出,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变成了知识分子,在这一基础之上对每个人进行阉割与规训,这是不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阐释了您所要表达的观点?

答:要知道,现代性这一叙事能够用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主题来讲述,所以你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讨方法。麦克卢汉(McLuhan)通过媒体等概念来探讨这一问题,因而也许书写时代就是个人主义最为盛行的时代;而只需观看的时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主体性更为弱化的时代。但这个时代相较于以往的主体性时代可能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现在我们能借此回到真正的具体性吗?我不太确定。我自己的理论认为我们对历史日益知之甚少,我们越来越漠视历史,我们没有先辈的历史感,因而被禁锢在当下。这不是说历史停止了,而仅仅意味着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问:所以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答:我们丧失了一种确定的历史感。我是说如果你认同历史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认同的历史观念是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一观点认为历史是诸如变革之类的力量。

问:这是进步论的观念,对吗?

答:这是进步论的历史观。不管怎样,在我看来这一观念在今天正在弱化。

问:您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后现代世界应当怎么做呢?

答: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所作为,历史……真正的历史在我看来是在经

济层面上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各个团体、集体行动以及组织层面上形成的。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往往只是表达、判断情状,将正在发生的事实及其对我们的影响组织形成理论。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够作为知识分子直接干预现实。在我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引人误解的称号,因为它描述的只是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并将自己的观点传递给民众的时代,也许它描述的不是大众,而是知识分子阶层,比如杂志等等。但这些已成历史,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旧政治形态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空间。仍然只有一些评论员,只有一些知识分子,我称之为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问:例如乔姆斯基(Chomsky)?

答:乔姆斯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我们现下处于新的信息系统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博客。那他们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不是。但我认为对我们最为重要的是,要确信在这样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仍然在对社会以及文化等等进行判断、作出分析。有一点相似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某种原因无所不知。因此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知道马克思……我们知道所有正确的事情。比起干预并告诉人们他们以前所知道的事情,艺术品要干预就更困难了,我理所当然想起了德国人,因为犬儒理性这一原因——我们知道价值,但拥有这一价值我们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界定艺术的政治功能这一概念是困难的。而我们往往倾向于考虑过去政治性艺术的价值,过去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我认为应当创造这种新价值的精神内核。人们不应该放弃改造社会的理念,但我觉得应当创造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政治干预形式。

问:能否认为法西斯主义反西方以及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是这种新干预理念的体现?

答:嗯,我不认为当今的政治,作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对应于资本主义某个特定的发展时期。

问:所以它们只是资本主义的变体?

答:我认为苏联革命当然是可以预见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模仿并加速了现代化以及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法西斯政权也是利用新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方式。我不认为我们还处于那种情形中,在那个时代出现的政党类型没有多少问题,无论是你说的纳粹抑或共产主义政党。如果你回顾我昨天讲课的内容,在阿拉伯之春以及其他地方涌现的新群体,它们是一种不同的集体运动,我们还不太清楚它们是如何发动的。我们已经遍观全球,在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保守的美国,对一种保守主义的怀念可能接近法西斯主义。你可以称其为儒家保守主义、法律秩序等等。有人怀念它们,但在我看来,它们并不符合历史的自然发展规律,因为很多条件都没有了,我们不能……当时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尽管结构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处于所有这些因素并存的时代,这是一个丰富的时代,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在发展,而我们拭目以待它们将何去何从,对于它们的结果我并没有答案。对于作者们应当如何书写、艺术应当有何作为,我不再持有定论。在我看来,我们应当非常谦逊,但对人们的实际行为要非常敏锐与好奇,从而发现什么是大势所趋,什么有发展前景,对我而言这才是问题所在。

问:所以您对后现代世界持乐观态度?

答:我认为混乱也是一种生态。很难对后现代世界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无论发生了什么,总会有新的可能,我们应当实验这些新的可能性。我们要有主动激发实验的活力,它将与过去不同。也许我们会失去某些重要的机会,或者也许实验会失败,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认为人们应当保持开放的心态。如果你采取一种完全消极的立场,那么当然你不会见到任何成果。我是指这个世界的结局之类,而你自己就退却了。

问:就像阿多诺(Adorno)一样?

答:阿多诺认为他仍然拥有某些艺术批评精神,但毋庸置疑阿多诺身

上有着强烈的文化悲观主义色彩。是的,也许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推动当代人前行的有益方式,因为其理论预先假设我们将走向失败。

问:那么,您认为我们从“近代的超克”这一理念中对我们今天能够起到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答:我不确定异化、美的意识以及精神的概念在今天是否有用,它们对我而言……

问:过时了?

答:是的,它们过时了,现代生活、当代生活、后现代生活无处安放这些概念。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事物重新加以组合,不再被诸如此类的旧理念束缚。

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答:显然,这令人惊叹,中国将成为并且现在也是世界主要权力之一。我最近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我不清楚中国正在迅速形成何种文化。他们的文化总体上发展很快,所以在我看来它证明了一个国家可以发展经济……在这个国家右翼经济学家总是告诉你,没有议会民主就不可能真正发展经济等等。我认为过去有着很多与这一结论相悖的例子。日本是另一个表明国家能够经济效益至上实现发展的例子。显然,紧随其后的是大量文化乱象,但我首先想知道中国众多农民的命运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总人口的60%还是多少的农民,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问:现在只有总人口的50%了。

答:50%,但还有渔民等等,这类人是不能从发展中获益的人群。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发展类似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资本主义自己就面临着大麻烦。

问:是的,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要现代、还要资本主义。

答:对,这也许是因为后来者居上。但我要说的是,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体系,中国需要作出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命运与这台机器联系在一起,或者创造出别的体系。你知道邓小平说过,你们是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他说,让西方发展所有你们的工业技术,然后为你们所用。在我看来中国应当保留这些选择,因为西方的问题,比如工资上涨、生产减少、市场缩小……每个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将面对这些问题,而中国也要面对这些。因此仅仅从当下来看,显然中国崛起令人惊叹。在过去,你们有着非常重要的革命,我的意思是,无论人们如何思考今天的情形,没有那场革命,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问: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东西方的接触日益频繁,东方与西方应当如何与对方交流和合作呢?

答:我认为我们不能再从这样的视角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说在我看来,我们都依赖文化与生产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不认为有东方式的工业生产、东方式的电脑。

问:但我们说的是文化,也许……

答:唔,文化,但你以同样的方式在写小说、制作音乐、拍摄电影。

问: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资源?

答:对这个我不大清楚,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保留旧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并将其与现代性融为一体,日本即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我甚至不清楚这种情形在日本是否确实,因为这是一个代际问题。我认为一旦青年一代与旧家庭相分离,这些旧有的传统、整个传统的概念都成问题。我认为一个全球体系将走向……我的意思是,中国已经存在于此处,而美国文化显然存在于彼处。我认为最终将形成多种民族文化的全球共生。我的意思

是我们从所有他人那里借鉴,从加勒比、日本,当然还有欧洲,甚至阿拉伯。所以我认为将有……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共生问题。世界的一部分仍然是反西方的……假设是……现代化的伊斯兰教,我指的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因为他们无所依凭……他们能够依赖的是小镇生活、隔离女性旧体系等等。他们对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没有任何向往,所以他们当然只能投身反西方运动中。大概在1900年,在中国等许多国家以及亚洲也有反西方人士,但是现在他们不复存在了吗?我不这么认为,这不是一个地理分布问题。所以现在有一种世界体系,我称之为后现代性与全球化。这是一种标准化体系,但它从不同文化的片段中加以借鉴。我认为问题是各个国家之间对日渐稀缺的资源展开的竞争和斗争,这是一个大问题。

问:这些稀缺资源有哪些?

答:比如石油,石油是最明显的例子,矿产也是。现在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比我们感受更深,因为他们已经在非洲开采这些矿产。

问:还有伊朗?

答:对,还有伊朗。所以这是真实的冲突,但这不是文化冲突。

问:文化资源又是怎样呢?您认为哪些文化资源是现代世界稀缺的?

答:我想稀缺的不是生产文化的资源,而是消费文化的受众。如果你将文化视为一种产品,那么它需要受众……它需要消费者。是的,美国电影在全球都有观众,对吧?其他国家能否制造一种拥有自身消费者的文化呢?我认为现在在这个方面音乐变得非常特殊。但我不认同文化产业……我不清楚……但中国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就像美国与苏联一样,它们可能不会面对这些问题,越南或者更小的欧洲国家甚至欧洲都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文化创造资源的问题,因为他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受众,但是拥有这些受众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问:在这一基础上,您在期待一种统一的世界文化?

答:我更愿意称之为标准化,我们无法得知它是否能够统一。

问:这些标准是什么?

答:制造食物、汽车、电脑等等所有这些产品的标准。

问:谁来制定这些标准呢?美国吗?

答:唔,我们已经认同美国制定的很多标准,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迈出了第一步,但并不是美国……正如你所说,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比现在的美国要现代得多。美国的所有事物都在分崩离析之中,你去看看欧洲……法国、德国还有中国以及许多地方,在革新的意义上都要更为现代化。所以我们是技术现代性先锋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永远领先。所以我认为标准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标准制定者,但人们可以想象改变这种情形,改变一种大一统文化的情形。一种民族文化独大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它也需要进行彻底改造,因为大多数独特文化正在消失。所以在文化层面上,我不清楚这会产生什么作用。记住它也是……我指标准化现在也是一个巨大的离心体系,所以如果你看看……我是说如果你看看美国与欧洲,同一产品的许多不同制造者都在运转着。他们不再是统一一体的,他们可能是平等的,他们可能是标准化的——每个人都有博客和电脑——但他们各不相同,所以我认为,在国家之间,在国家内部,一种不同声音、不同群体等等的巴别塔将逐渐形成。这是否意味着冲突,或者意味着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其他类型的网络空间呢?

问:所以它既是标准化的,也是多样化的?

答:是的,也是多样化的。

问:那么我们能否像福山(Fukuyama)所认为的那样,将这作为历史的终结呢?

答:我觉得很难这么认为,因为我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的体系。而正如我们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看到的……资本主义体系确实有其无法克服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取得的这种巨大成功……我认为当时的一些可能性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忘了他写作那本书的确定时间,但是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是这之后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还不清楚,但知识分子的作用恰恰在于对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断进行关注和表现。